

# 70 余年前的一本抗日歌书

章星虹

文史活动消息站

<https://singaporehistoryworkshop.wordpress.com/2013/03/15/70%E4%BD%99%E5%B9%B4%E5%89%8D%E7%9A%84%E4%B8%80%E6%9C%AC%E6%8A%97%E6%97%A5%E6%AD%8C%E4%B9%A6/>

这本薄薄的歌书，像一个从遥远时空不期而至的小使者，把我们带回到 70 余年前的星马地区……

1938 年 12 月 18 日，入夜时分，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。从大世界第三台的太平洋戏院，传来雄浑激昂的合唱歌声，振奋感人的舞台剧对白声。时年 64 岁的陈嘉庚（1874-1961）坐在台下，跟逾千名观众一道观看了这场演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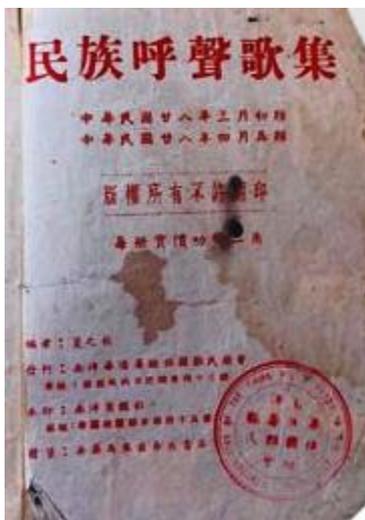
四个月后的陈嘉庚为这本歌曲集作序，序文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全团登台，气象严肃。歌声入耳，闻所未闻。但觉耳际有（犹）如万马奔腾，怒潮汹涌；剧艺出场，见所未见，恍如置身故国烽火之区，目击同胞流离之惨。表演寇军兽行，使人忿恨填膺；比将暴敌歼除，又使人痛快鼓掌。……”

他笔下的这场演出，是中国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救亡筹赈演出；而这本歌曲集，则是合唱团在星马地区演出期间印行的一本抗日歌曲结集本。

说到武汉合唱团，本地老辈人没有不知晓的——1938 年 9 月，28 名年轻文艺工作者在团长夏之秋（1912-1993）的带领下开赴南洋，“以歌咏、戏剧、演讲为武器”宣传抗日救亡。然而，提到该团在星马出版的那本抗日歌曲集，亲眼见过的人则少之又少。人们发现，这本战前在南洋流传甚广的歌书，战后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；今天的我们，更只能从旧日报纸、资料汇编和老辈人口述回忆中，想象它昔日的模样。

《民族呼声歌集》

不久前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们在一名专事修复旧唱片的友人手中，看到一本旧歌书。接过书翻开一看，顿感欣喜莫名：“武汉合唱团”、“陈嘉庚”、“夏之秋”、“南侨筹赈总会”，一个个“关键词”蹦入眼帘——这不正是武汉合唱团当年在星马印行的抗日歌曲集么？



这本薄薄的歌书，像一个从遥远时空不期而至的小使者，把我们带回到 70 余年前的星马地区，也让我们看到一段有关陈嘉庚与一本歌书的往事。

这本歌书印行于 1939 年 4 月，距今 70 余年，书页已泛黄发黑，书脊书角亦已破损，然书中的数十支歌谱，依然完好无缺，清晰如昨。书中共收录 48 首抗日歌曲，均为合唱团在星马每场筹款演出的基本曲目，有聂耳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贺绿汀曲《保家乡》、何香凝词《赠寒衣予负伤将士》、野青吕骥词曲《中华民族不会亡》，还有《满江红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等。身为作曲家的夏之秋，也有多首作品收录在这本歌集中，包括《女青年战歌》、《游击进行曲》、《歌八百壮士》、《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》等等。

歌书的设计，用朴素二字形容，最为恰当。只见素色封面上，印着“民族呼声歌集”六个黑字，庄重而大气。据《南洋商报》1939 年 4 月报道：“《民族呼声》歌集，封面系用蒋委员长对该团赠旗之题字，内页有高总领事之题字。”

翻开首页，即见陈嘉庚为这本歌集写的序言。《南洋商报》在报道中特别强调：“陈氏此点文字，向所未有，诚为创见。”但见整篇序文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武汉合唱团南行义举的高度赞誉：“声容所至，感动全侨，遥应祖国前方抗战之精神，默增海外华侨救国之力量，劳绩至伟，卓然不磨。”

同时，陈嘉庚也提到合唱团此行的教育角色：合唱团来到星马以后，不仅奔波劳顿、高歌救亡，在“文化启发，教育熏陶”方面亦不怠慢。夏团长“浸浴于群众热情鼓舞之中，欣然将其歌谱，编订成集，付托南侨筹赈总会刊；而”民众学习歌唱之殷勤，教师求取歌谱之迫切，真诚涌露”，令自己“感发至深。”

救亡运动在哪里，歌咏也在哪里

这本歌集的编者，是合唱团的团长夏之秋。早在合唱团刚成立时期，夏团长就想过出版一册“新颖和合用的歌咏集”，专给救亡歌咏队使用。然而，“当时因交通不便，纸价飞涨，和缺乏印机等重重困难，未能如愿。”

那么，合唱团到达星马仅仅数月，如何有能力出版歌集一册呢？

合唱团团员陈蔚女士在晚年回忆说，除了团员们的鼎力合作，如抄谱、校正歌词、校对歌谱等，这与南侨总会和陈嘉庚主席的鼎力相助亦是分不开的：“为了多筹募一些义款，在得到陈嘉庚主席的同意之下，夏之秋团长把合唱团所唱的抗日歌曲灌录唱片、编印成册，很多侨胞争相购买。一时间，抗日歌曲风靡新马。”

从该书的出版资料也可看到，封底发行人一栏，写着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，旁边还盖着总会的红色大印，地址是“新嘉坡武吉巴梭律 43 号”，正是具有久远历史的怡和轩俱乐部。怡和轩在新加坡历史上曾扮演的特殊角色，此时又添一佐证。

本着“救亡运动在哪里，歌咏也在哪里”的信念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合唱团都带着这本歌集，分发给那里的民众。拿到歌本，大家传唱习咏，每每“待到合唱团演出结束时，观众都能与合唱团一道共歌一曲。”

老作家田流找这歌书找了几十年

为了多些了解这本 70 年前印行的抗日歌曲集，我们走访了本地华文作家田流先生。今年 82 岁的田流，战前 10 岁左右就参加救亡歌咏队，到今天他仍能演唱百多首抗日歌曲。

听说我们见到《民族呼声歌集》，田流掩不住惊喜之情：“我找这本歌书，找了几十年！你们能见到这本歌集，实在太难得了！”

谈到这本歌曲集在战后几近消失的原因，田流说：“在日据时期，若被日军发现藏有这本书，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！”

老作家告诉我们：“日据初期，有一天我父亲见到我偷偷翻看这本歌书，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。他的一个朋友因藏有抗日书，被汉奸告发，日本人把他们全家都杀掉了！这是一件真实的事例，我听了很害怕，就连忙把这本歌书烧掉了。那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把有抗日内容的书通通烧掉了。”

因此田流一再说：“这本歌曲集非常珍贵。听说你们见到了这本歌书，我真的好高兴！”

潘受《卖花词》依旧回荡

《卖花词》是这本歌集的最后首歌，也是48首歌曲中唯一一首在星马创作的抗日歌。

据夏之秋团长晚年回忆，在星马演出期间，他力邀时任陈嘉庚秘书的潘受先生，为合唱团做一首歌。有感于当时星马一带满街的卖花声，潘受写下这首《卖花词》，由夏团长谱曲，遂以艺术歌咏的形式凝固了当年中小学生为救亡募捐的情景。

这首歌的最早演唱者，是合唱团女高音、年仅19岁的江心美。一把柔美的女声，幽幽地唱着，声调起伏之间流露出丝丝伤感，闻者无不动容。很快地，这首歌在南洋各地的华人社群中传开，也令更多人参加到歌咏筹赈、卖花募捐的行列。诚如陈嘉庚先生在序文中所说：“……武汉合唱团只28人，亦只28人之歌声耳。乃初到星洲，歌声一出，即轰动全南洋。今更加以歌集发行，人人习之，（故）人人能做武汉合唱团之歌声，人人亦可为武汉合唱团之团员。”

今天，陈嘉庚与武汉合唱团的筹赈救亡故事，仍在星马一带传诵着。在新加坡“晚晴园—孙中山南洋纪念馆”的二楼展厅里，人们还能听到曾一度响遍星马街头的《卖花词》：

”先生，买一朵花吧！

先生，买一朵花吧！

这是自由之花呀，这是胜利之花呀，

买了花呀，救了国家。……”

这本歌书印行于1939年4月，距今70余年，书页已泛黄发黑，书脊书角亦已破损，然书中的数十支歌谱，依然完好无缺，清晰如昨。书中共收录48首抗日歌曲，均为合唱团在星马每场筹款演出的基本曲目。

（联合早报 25/01/2013 早报现在文艺城）

1938年12月18日，入夜时分，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。从大世界第三台的太平洋戏院，传来雄浑激昂的合唱歌声，振奋感人的舞台剧对白声。时年64岁的陈嘉庚（1874—1961）坐在台下，跟逾千名观众一道观看了这场演出。

四个月后的陈嘉庚为一本歌曲集作序，序文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全团登台，气象严肃。歌声入耳，闻所未闻。但觉耳际有（犹）如万马奔腾，怒潮汹涌；剧艺出场，见所未见，恍如置身故国烽火之区，目击同胞流离之惨。表演寇军兽行，使人忿恨填膺；比将暴敌歼除，又使人痛快鼓掌。……”

他笔下的这场演出，是中国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的第一场救亡筹赈演出；而这本歌曲集，则是合唱团在星马地区演出期间印行的一本抗日歌曲集本。

说到武汉合唱团，本地老辈人没有不知晓的——1938年9月，28名年轻文艺工作者在团长夏之秋（1912—1993）的带领下开赴南洋，“以歌咏、戏剧、演讲为武器”宣传抗日救亡。然而，提到该团在星马出版的那本抗日歌曲集，亲眼见过的人则少之又少。人们发现，这本战前在南洋流传甚广的歌书，战后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；今天的我们，更只能从旧日报纸、资料汇编和老辈人口述回忆中，想象它昔日的模样。

### 《民族呼声歌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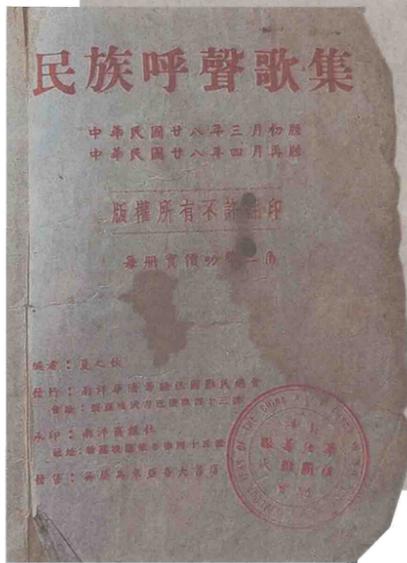
不久前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们在一名专事修复旧唱片的友人手中，看到一本旧歌书。接过书翻开一看，顿感欣喜莫名：“武汉合唱团”、“陈嘉庚”、“夏之秋”、“南侨筹赈总会”，一个个“关键词”蹦入眼帘——这不正是武汉合唱团当年在星马印行的抗日歌曲集么？

这本薄薄的歌书，像一个从遥远时空不期而至的小使者，把我们带回到70余年前的星马地区，也让我们看到一段有关陈嘉庚与一本歌书的往事。

这本歌书印行于1939年4月，距今70余年，书页已泛黄发黑，书脊书角亦已破损，然书中的数十支歌谱，依然完好无缺，清晰如昨。书中共收录48首抗日歌曲，均为合唱团在星马每场筹款演出的基本曲目，有聂耳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贺绿汀曲《保家乡》、何香凝词《赠寒衣予负伤将士》、野青吕骥词曲《中华民族不会亡》，还有《满江红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等。身为作曲家的夏之秋，也有多首作品收录在这本歌集中，包括《女青年战歌》、



武汉合唱团在星马演出。



《游击进行曲》、《歌八百壮士》、《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》等等。

歌书的设计，用朴素二字形容，最为恰当。只见素色封面上，印着“民族呼声歌集”六个黑字，庄重而大气。据《南洋商报》1939年4月报道：“《民族呼声》歌集，封面系用蒋委员长对该团赠旗之题字，内页有高总领事之题字。”

翻开首页，即见陈嘉庚为这本歌集写的序言。《南洋商报》在报道中特别强调：“陈氏此点文字，向所未有，诚为创见。”但见整篇序文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武汉合唱团南行义举的高度赞誉：“声容所至，感动全侨，遥应祖国前方抗战之精神，默增海外华侨救国之力量，劳绩至伟，卓然不磨。”

同时，陈嘉庚也提到合唱团此行的教育角色：合唱团来到星马以后，不仅奔波劳顿、高歌救亡，在“文化启发，教育熏陶”方面亦不怠慢。夏团长“浸浴于群众热情鼓舞之中，欣然将其歌谱，编订成集，付托南侨筹赈总会刊；而“民众学习歌唱之殷勤，教师求取歌谱之迫切，真诚涌露”，令自己“感发至深。”

### 救亡运动在哪里，歌咏也在哪里

这本歌集的编者，是合唱团的团长夏之秋。早在合唱团刚成立时期，夏团长就想过出版一册“新颖和合用的歌咏集”，专给救亡歌咏队使用。然而，“当时因交通不便，纸价飞涨，和缺乏印机等重重困难，未能如愿。”

那么，合唱团到达星马仅仅数月，如何有能力出版歌集一册呢？

合唱团团员陈蔚女士在晚年回忆说，除了团员们的鼎力合作，如抄谱、校正歌词、校对歌谱等，这与南侨总会和陈嘉庚主席的鼎力相助亦是分不开的：“为了多筹募一些义款，在得到陈嘉庚主席的同意之下，夏之秋团长把合唱团所唱的抗日歌曲灌

# 70余年前的 一本抗日歌书

章星虹 / 文

这本薄薄的歌书，像一个从遥远时空不期而至的小使者，把我们带回到70余年前的星马地区……

录唱片、编印成册，很多侨胞争相购买。一时间，抗日歌曲风靡新马。”

从该书的出版资料也可看到，封底发行人一栏，写着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，旁边还盖着总会的红色大印，地址是“新加坡武吉巴梭律43号”，正是具有久远历史的怡和轩俱乐部。怡和轩在新加坡历史上曾扮演的特殊角色，此时又添一佐证。

本着“救亡运动在哪里，歌咏也在哪里”的信念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合唱团都带着这本歌集，分发给那里的民众。拿到歌本，大家传唱习咏，每每“待到合唱团演出结束时，观众都能与合唱团一道共歌一曲。”

### 老作家田流找这歌书找了几十年

为了多些了解这本70年前印行的抗日歌曲集，我们走访了本地华文作家田流先生。今年82岁的田流，战前10岁左右就参加救亡歌咏队，到今天他仍能演唱百多首抗日歌曲。

听说我们见到《民族呼声歌集》，田流掩不住惊喜之情：“我找这本歌书，找了几十年！你们能见到这本歌集，实在太难得了！”

谈到这本歌曲集在战后几近消失的原因，田流说：“在日据时期，若被日军发现藏有这本书，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！”

老作家告诉我们：“日据初期，有一天我父亲见到我偷偷翻看这本歌书，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。他的一个朋友因藏有抗日书，被汉奸告发，日本人把他们全家都杀掉了！这是一件真实的事例，我听了很害怕，就急忙把这本歌书烧掉了。那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把有抗日内容的书通通烧掉了。”

因此田流一再说：“这本歌曲集非常珍贵。听说你们见到了这本歌书，我真的好高兴！”

### 潘受《卖花词》依旧回荡

《卖花词》是这本歌集的最后首歌，也是48

首歌曲中唯一一首在星马创作的抗日歌。

据夏之秋团长晚年回忆，在星马演出期间，他力邀时任陈嘉庚秘书的潘受先生，为合唱团做一首歌。有感于当时星马一带满街的卖花声，潘受写下这首《卖花词》，由夏团长谱曲，遂以艺术歌咏的形式凝固了当年中小学生对救亡募捐的情景。

这首歌的最早演唱者，是合唱团女高音、年仅19岁的江心美。一把柔美的女声，幽幽地唱着，声调起伏之间流露出丝丝伤感，闻者无不动容。很快地，这首歌在南洋各地的华人社群中传开，也令更多人参加到歌咏筹赈、卖花募捐的行列。诚如陈嘉庚先生在序文中所说：“……武汉合唱团只28人，亦只28人之歌声耳。乃初到星洲，歌声一出，即轰动全南洋。今更加以歌集发行，人人习之，（故）人人能做武汉合唱团之歌声，人人亦可为武汉合唱团之团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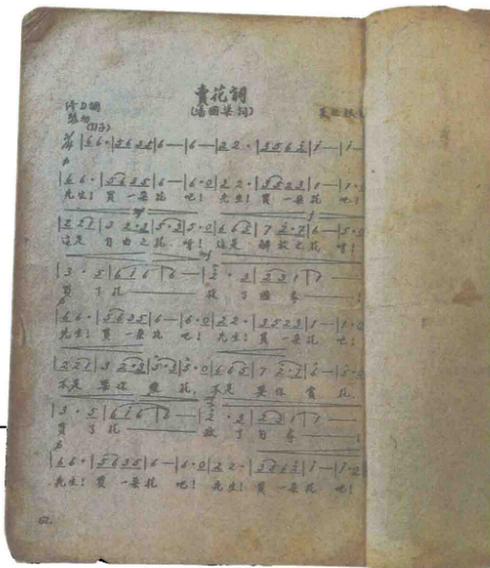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陈嘉庚与武汉合唱团的筹赈救亡故事，仍在星马一带传诵着。在新加坡“晚晴园—孙中山南洋纪念馆”的二楼展厅里，人们还能听到曾一度响遍星马街头的《卖花词》：

“先生，买一朵花吧！”

先生，买一朵花吧！

这是自由之花呀，这是胜利之花呀，买了花呀，救了国家。……”

歌集中的最后一首是《卖花词》。



这本歌书印行于1939年4月，距今70余年，书页已泛黄发黑，书脊书角亦已破损，然书中的数十支歌谱，依然完好无缺，清晰如昨。书中共收录48首抗日歌曲，均为合唱团在星马每场筹款演出的基本曲目。